

一条宗旨,因为他们以毕生精力搜集、考订、辨正史料,“不著史而成就了可以永远为法式的辨史料法。亭林、百诗这样对付历史学和语言学,是最近代的:这样立点便是不朽的遗训。”^①可见傅氏心目中的新历史考证学,根基还在于清代考据学。只不过在吸收清代学者之长处的同时,他主张还要进一步扩张研究的材料和研究的工具,这自然是现代历史学对于科学的史学研究的要求。

可以说,以新历史考证学为代表的民国人文学术,在精神和方法上都与清代学术一脉相承,很多学术论题,像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陈垣、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钱穆等大师所做的具体考证工作,不少都是清代学者所提出而未完成的学术命题。尽管有学者认为:“近代学人所指称的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用后来的一般科学常识观念观察认识的认识,未必合于清代学术的本相。”^②但这并不妨碍清学对民国学术有重要影响的基本判断的形成,即使民国学者对清学的估价可能有误解的成分,可大家共同关注于此,反恰说明清学的巨大魅力和现实价值所在。

要重视对民国学人群体的研究

郑大华 (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我们研究民国思想文化,离不开对民国学人群体的研究。学人群体的大量出现,是民国时期思想文化界独有的风景。清末多是政治团体,而很少学人群体,如保皇会、政闻社等各式的立宪政团体、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同盟会等各式各样的革命团体,这都是政治团体,就是国粹派,也是一身而二任,既是政治派别,又是学人群体。而到了民国时期,除政治团体外,大量的学人群体出现,学术界通常都把这些学人群体称之为“什么什么派”,如“新青年派”、“东方文化派”、“现代评论派”、“甲寅派”、“学衡派”、“新月派”、“独立评论派”、“新路派”、“村治派”、“中国农村派”、“战国策派”、“新观察派”,如此等等,大约有二三十种之多。为什么在民国时期会出现这么多学人群体呢?我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和壮大,尤其是留学欧美学成归国者成为民国学人群体的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据李华兴主编的《民国教育史》的估计,清末至民国我国官费或自费到欧美日本留学的学生至少在10万人以上(有学者估计是30万人)^③。除极少数滞留未归外,这10多万留学生绝大多数学成后都回到了国内。1937年的《清华同学录》,收录留学生1152人,其中学成归国者1131人,回国率高达98%以上。^④我们上面谈到的那些“什么什么派”,基本上都是以留学生为中坚形成的。与清末的保皇会、政闻社、同盟会等政治团体的成员比较,民国时期学人群体的成员有以下不同特征:清末政治团体的成员大多是1880年以前出生的,和那时的中国人一样,他们出生后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学习的是儒家四书五经,其中不少人还考取过进士、举人、秀才的功名,后因时代的变化,他们顺时而为,通过种种方式(如短期的出国留学,或上国内新式学堂,或自学),学习了一些西学,掌握了一些西学知识,但程度十分有限,没有也不可能对西学有系统深入的了解。故他们属于新旧过

①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1928年10月。

② 桑兵《分说:近代学术的清学纠结》,桑兵、关晓红主编《近代学术的清学纠结》,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6页。

③ 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50页。

④ 见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枫城出版社1978年版,第170页。转引自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80页。

渡时期承上启下的一代,带有明显的“新旧杂糅”特色。这就决定了他们既与传统的士大夫不同,或多或少已具有近代知识分子的一些思想取向和特质,如认同和接受了西方的进化观、进步观、国家观、国民思想,以及立宪或共和的政治制度,但同时又和传统的士大夫一样,是“通才”而非“专家”,尤其是经济上还无法做到真正独立。

民国时期的学人群体多为1890年后出生的学者,其成长过程遇到了科举制的废除和清王朝的被推翻,新式的学校教育已取代传统的私塾和书院教育,读书的目的也已不再是获取功名。他们中的不少人除了在国内接受新式的学校教育外,还留学欧美接受过西方的高等教育,对西方学术文化比较了解并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社会职业,可称为真正意义上的近代知识分子。陈谦平对“独立评论派”学人群体的分析显示:“在32位社员和主要撰稿人中,有31人留学过欧美,占总人数的96.87%,其中留学美国者27人,占87%,19人获得博士学位,留学欧洲4人,1人获得博士学位;6人是理工科教授,26人是人文社会学科教授,其中政治学9人,经济学5人,史学4人,文学和教育学各2人,哲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各1人。”^①

其次,民国时期的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更加复杂,中外文化之间的交流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加速了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及学人群体的结合。不同的阶级、阶层和政治势力围绕“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根本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并展开过激烈而复杂的政治和思想斗争。这为民国时期学人群体的大量出现提供了不竭的思想动力。以思想文化为例,我曾在《民国思想史论》一书中指出,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思想文化比较单一,主要是封建主义文化;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产生了新的资本主义思想文化;民国建立后,又产生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思想文化。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民国时期存在着三种性质不同的思想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半封建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以五四运动为标志,将中国新文化分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和“旧民主主义文化”两部分,“旧民主主义文化”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属于世界资产阶级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属于世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殖民主义文化”是日寇侵略中国东北三省后而出现的、以灭绝中国文化为目的、更具有反动性和落后性的文化。多种性质的思想文化的存在,决定了民国时期的思想文化斗争比之清末乃至整个晚清也都更加尖锐、激烈和错综复杂。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民国时期思想文化斗争的错综复杂实际上是民国时期政治斗争尖锐激烈的反映。民国时期的新式知识分子,从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文化取向出发,对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中西文化冲突进行冷静思考,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进行积极探索,从而提出了精彩纷呈、各具特色的方案。为了充分表达自己的方案并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这些新式知识分子以创办同仁刊物的方式,结合成民国时期不同的思想和学术性学人群体。

再次,民国报刊业的发达,为新式知识分子结合成志趣相投的学人群体和自由表达自己的主张提供了极大便利。中国近代的报刊,是鸦片战争以后才开始创办的,是西方近代文化传入中国的产物。徐松荣的研究显示:“1898年到1911年,国内先后创办的比较知名的报刊达200种以上。其中上海最多,达80种以上,杂志多于日报;其次是北京、广州、武汉、天津、长沙,北京、广州都在30种以上。”^②中国报刊业的快速发展是在民国时期,尤其是在五四运动以后。据《第二届世界报界大会记

① 陈谦平:《抗战前知识分子在自由理念上的分歧——以〈独立评论〉主要撰稿人为中心的分析》,李金铨编《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8页。

② 徐松荣:《维新派与近代报刊》,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页。

事录》的记载,1921年全国有报纸1134种。^①此后,报刊的发展更是空前。据相关资料统计,民国时期报刊业非常发达,仅中共创办的报刊就有4505种;全国报刊达到6万种左右。

为什么民国时期报刊业这么发达?我觉得其中比较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民国时期有着相对宽松的办报办刊环境,有着自由创办报刊的空间。民国时期报刊业的发达和相对宽松的办报办刊环境,为民国学人们结合成思想志趣相投的学人群体提供了基本条件,而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相对优厚的经济收入,使他们有能力以自筹资金的方式创办同人刊物,从而形成一个个学人群体。如《新青年》之于“新青年派”学人群体,《现代评论》之于“现代评论派”学人群体,《新月》之于“新月派”学人群体,《战国策》之于“战国策派”学人群体,《观察》之于“观察派”学人群体,如此等等。

最后,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也是形成民国学人群体的重要原因。我们前面讲到,民国时期维系学人群体的纽带是共同的思想取向或学术旨趣。但为什么一些具有相同思想取向和学术旨趣的新式知识分子或学人并没有结合成一个学人群体?比如,独立评论派无疑是自由主义的学人群体,但并非所有自由主义新式知识分子或学人都是这一群体的成员。所以,除了思想取向和学术旨趣外,其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也是形成学人群体的重要因素。我们以“学衡派”学人群体为例,分析民国时期的学人群体是怎样形成的。“学衡派”学人群体的形成始于《学衡》杂志的创办,而《学衡》杂志的创意始于梅光迪。梅光迪是1911年考取清华官费留学生赴美的,初入威斯康辛大学,1913年转入西北大学文学学院学习,1915年春毕业。是年夏,与胡适、任鸿隽等留美同学在绮色佳城度假,彼此讨论中国文字与文学问题,两人发生激烈争论。不久,因柯瑞恩介绍,得读白璧德的《现代法国批评大家》,惊为圣人复生,遂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专攻文学。作为白璧德的第一位中国门生,梅光迪完全接受了乃师的新人文主义学说,并以此为理论依据继续就中国文字与文学问题与胡适展开论战,最后将胡适“逼上梁山”,公开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1917年胡适学成归国,投身新文化运动并“暴得大名”,成为新文化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后,仍留在美国的梅光迪也在积极的“招兵买马,到处搜求人才,联合同志,拟回国对胡适作一全盘之大战”,一决雌雄。不久,经原清华同学施济元的牵线搭桥,梅光迪结识了也在哈佛留学、同为白璧德弟子的吴宓。1919年10月,梅光迪学成归国,先任南开大学英文系主任,翌年,应留学美国西北大学时的同学、时任东南大学副校长刘伯明的邀请,转任东南大学英文系教授。

在东南大学,梅光迪先后结识了和他一样对新文化运动持批评态度的胡先骕(留美,东南大学生物系主任)、柳诒徵(曾游学日本,东南大学历史系教授)、邵祖平(东南大学附中国文教师)等人,并与上海中华书局约定,由梅氏等人编辑一份名为《学衡》的月刊,交由中华书局印刷发行。他还通过刘伯明征得东南大学校方同意,聘请远在美国的吴宓回国任东南大学英语系教授。1921年秋,吴宓入东南大学英语系任教。此时,《学衡》杂志已由刘伯明、梅光迪等人发起,并主持筹办。吴宓到校后,即接手具体的编务工作,并在他的寓所召开了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全体社员大会。出席会议的除吴宓、梅光迪和刘伯明外,还有胡先骕、萧纯锦(留美,东南大学经济系主任)、徐则陵(留美,东南大学历史系主任)、马承堃(暨南大学教授)、柳诒徵、邵祖平,共8人,除马承堃,其余7人都是东南大学的老师。会议决定了杂志的体例,分为通论、述学、文苑、杂俎、书评和附录6门,并推定梅光迪、马承堃、胡先骕、邵祖平分别为通论、述学、文苑、杂俎各门的主任编辑,吴宓为杂志的总编辑兼干事,具体负责杂志的编务及日常事宜。后来虽然又陆续增补柳诒徵、汤用彤为干事,缪凤林为副总编辑,

^①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第287页。

但实际上编务工作自始至终都是由吴宓 1 人承担。

经过几个月的筹办,1922 年 1 月《学衡》第 1 期由中华书局印刷发行。从 1922 年创刊到 1933 年停刊,据不完全统计,《学衡》共发表文章四百多篇,先后为《学衡》撰文者(包括译文)达百人以上,其中撰稿较多者有柳诒徵(55 篇)、吴宓(42 篇)、缪凤林(24 篇)、景昌极(23 篇)、王国维(20 篇)、胡先骕(18 篇)、张荫麟(14 篇)、刘永济(12 篇)、林损(12 篇)、汤用彤(8 篇)、郭斌龢(8 篇)、刘伯明(7 篇)、孙德谦(7 篇)、徐震堦(6 篇)、梅光迪(5 篇)、胡稷咸(4 篇)、吴芳吉(4 篇)、王恩洋(4 篇)、李思纯(3 篇)、刘朴(3 篇)、陈柱(3 篇)、叶玉森(3 篇)、杨成能(3 篇)等。这些人既是《学衡》杂志的主要作者,也是学衡派学人群体的中坚力量。

考察这些学人的资料,可以发现这样三个特点:(一)他们大多是留美学生,如刘伯明、梅光迪、吴宓、胡先骕、汤用彤、刘朴、张荫麟、郭斌龢等都曾留学过美国,其中不少人还是白璧德的学生。(二)他们大多是东南大学和清华学校的师生,更确切地说,前期主要以东南大学为主,总编辑兼干事吴宓转任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后,则变为东大和清华并重。(三)他们大多是大学教授,有的还是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如王国维是著名的国学大师,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刘伯明、梅光迪、吴宓、胡先骕、汤用彤等是东南大学教授,其中刘伯明是著名哲学史家,梅光迪、吴宓是西洋文学史家,吴氏还是著名的红学家和中国比较文学的开山者,胡先骕是著名的植物学家,中国植物学会首届会长,柳诒徵是著名的史学家,他撰写的《中国文化史》直到现在还非常有名,汤用彤是佛学史专家。吴芳吉是西北大学教授,著名的诗人。缪凤林和张荫麟分别是东北大学和清华大学教授,历史学家。如此等等。以上这三个特点,实际上反映的是“学衡派”学人群体形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我们要研究“学衡派”学人群体,就必须对它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进行深入的研究。

(责任编辑:左玉河)

(责任校对:尹媛萍)